

# 先秦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初探

## ——兼论古代文化交融的途径与方式

· 袁士京 ·

本文旨在通过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基本特征的论述，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初期的真谛，并就古代文化交融的途径与方式作初步的探索。

—

长江流域的青铜铸造业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相当于中原夏商、西周（一些地区延至春秋初期），后期为东周时期。由于长时期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加之地域辽阔，部族繁杂，地理环境相异，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与中原政权亲疏不一，相互影响程度不同，表现在文化面貌上差异较大。

在江苏、安徽长江沿岸的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现有“湖熟文化”。50年代著名学者曾昭燏、尹焕章曾根据出土铜镞、斧、鼎耳、鱼钩、锈渣等，认为“当时人们已掌握冶铜技术”，提出“冶铜技术由北而南的可能性要比较大些，但这不等于否定了江南地区有独立发明冶铜技术的可能性”<sup>(1)</sup>，并推断湖熟文化的上限在殷末以后，应该承认，他们在当时资料条件下，作出上述推断是相当有勇气的，但对江南青铜文化的认识限于资料仍很模糊，年代的推断囿于传统观念相差甚远。碳14测定表明，湖熟文化并非迟至“殷末以后”，其早期为1540B.C±90年（相当于商代初期），晚期为1195B.C±105年（相当于西周初期）<sup>(2)</sup>。北阴阳营上层（早期湖熟文化）的两个标本（91、92）分别为1820B.C±135和1387B.C±165年<sup>(3)</sup>，则可能更早些。湖熟文化铜器冶铸工具

是陶钵和陶勺（挹灌铜液用），与中原灰陶大口尊、将军盔等冶铜工具不同，说明其冶铸方法相异，具有地域特色。而且其铸造水平已相当成熟，在此以前，还应有一个相当长的萌芽时期。

在赣江——鄱阳湖地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遗址已发现近200处，其中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最具代表性。该遗址年代上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至商末周初。该文化出土物有几点特别值得重视：

一，出土的青铜斝、刀、矛、戈、器盖等造型美观大方，纹饰丰富华丽，其工艺水平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不相上下，说明当地的青铜铸造业相当发达。1976年在吴城发现3件铜兵器（戈二、矛一），戈的形式与中原相似，但矛、戈上的纹饰作风与中原迥然不同，独具风格。<sup>(4)</sup>

二，出土一批浇铸斧、铤、凿、刀、镞、斝（足）的石范，而商周则以陶范铸器为传统，表明即使是比较相象的铜器，其铸造方法也不同。

三，吴城出土的陶器和石范上发现150多个刻划符号或文字，少则一、二字，多则十二字，对于这类文字，有学者认为其中第一期陶器上的刻文可能是另一种已经失传的文字<sup>(5)</sup>。

吴城遗址经李伯谦、邹衡、彭适凡诸先生研究，认为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应命名为吴城文化”<sup>(6)</sup>。最近，江西新赣县在一个坑内发掘出大批商代文物，其中青铜器300余件，种类达十多种，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不同，具有十分鲜明的南方特色，这一惊人发现引起考古界高度重视，提出：史称江南为“南蛮”之说，可能因此被推翻，对于研究商代南方青铜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

m.

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早在殷王武丁时，荆楚已作为南方的一股势力处于与殷对抗的地位，周初正式建都立国后，史籍中也屡屡传达了周楚抗衡的信息。春秋战国时辉煌瑰丽的楚文化应是在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几乎同时并行发展的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楚吸收了来自中原商周先进文化因素，同时也融合了西部巴蜀、南方百越的某些因素，春秋以前楚铜器的个性尚不鲜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春秋之前楚铜器完全没有个性，更不是与中原铜器“没有区别”，楚铜器本身是融合的产物，它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到春秋中期前后，随着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终于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楚式铜器。

属于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是巴蜀的活动区域。现代考古使巴蜀古国神秘的色彩正在剥落，四川广汉古城址及三星堆古青铜雕像群的发现，使早期巴蜀青铜文化重见天日，令人叹为观止。从数量上看，800余件金、铜、玉石、陶器中，青铜器占有较大比重，总重量竟达一吨，为同时代青铜文化所未见。形式古朴，艺术价值极高的青铜雕像群尤为珍贵，一尊青铜人像连座高达262厘米，还有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的数十尊青铜头象。另有高1.4米的青铜“神树”一棵，上有奇特的飞禽走兽，枝叶果实，其风格与中原相异，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青铜艺术史的空白，而且为青铜铸造工艺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sup>(8)</sup>。表明巴蜀早期青铜文化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它与夏商青铜文化并行发展，具有自己的发展体系和独特的文化面貌，既有别于夏商周文化，又是构成中华古文明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曾存在过独立发生、发展的青铜文化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前期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总的发展水平似乎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但由于长江流域是古代铜锡矿的重要产地，当地先民很早就学会了采矿、冶炼的技术，从大冶铜绿山采冶技术的先进性，可知那里的有关技术已渡过了它的原始阶段，冶铸技术可能是独立发生的。就目前资料而言，湖熟文化、吴城文化、早期巴蜀文化至迟在夏商之际已有自己的冶铸业，生产小型工具、容器，直至大型青铜雕

象。各地土著青铜文化的自身特点十分突出，存在着异于中原的发展序列，所出器物中形制、纹饰与中原相似的占有较大比例，但大都以地方化的中原型铜器出现，经过了一番改造，尤其是纹饰上多以变种形式出现，中原常见的夔纹、饕餮纹，凤鸟纹都有明显的变化，或出现有异于中原的几何线纹，来源于当地的印纹陶纹饰。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地方型铜器，为中原所未见。如屯溪墓出土的五柱器、撇足鼎、烟墩出土的角状器、鬲、仪征出的高档袋足独环耳鬲及常见的乐器句鑿、镂空盘（炉）等。此外，礼器极少，有铭器罕见，铸器不精，随葬铜器不多等都表明长江流域青铜业落后于中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古代文明的内涵与特点各有异同，它们既然都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同阶段，其间必然有反映历史规律的共同性，由于社会条件以及自然、地理的不同，文化面貌不可避免地出现差异，表现出各自的特点，研究文明发初初期的物质形态，尤其应兼顾这种共同性和特殊性，不应简单地把外因看作唯一发展的因素。

## 二

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长期被华夏列国视为落后的“蛮夷”，古籍中关于这一地区的记载直到春秋中叶还很少。其实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李学勤先生指出“……事实上，长江下游诸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研究金文的学者早就指出，吴、越、徐等国青铜器制作优美，铭文用韵精严，反映着高度的文化水平。过去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实在是一种误解”<sup>(9)</sup>。不消除误解、打破偏见，中华文明发展的真谛就难以寻觅。

在江苏南部及其毗连的皖南、上海、浙北发现大批的土墩墓。其早期与湖熟文化晚期相衔接，约当中原西周前期，晚期约当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sup>(10)</sup>。土墩墓中时见青铜器出土，如丹徒烟墩山、皖南屯溪的西周墓，出土铜器大多具有江南特色。西周以后的青铜器在江浙皖一带更是多见，不少研究者将其纳入吴越文化的范畴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吴越青铜器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呈异军突起之势，从器型到纹饰都具有浓厚

的地方色彩，自成体系和特色，器形种类增多，数量也大增。器物造型上多有自己风格，如扁体簋流行，中原式圆体簋消失。兵器铸造精良，生产工具大量涌现，常见的有锄、镰、削、双孔半圆形钺、蛋壳形钺及斤、矛、戈、剑等，与文献记载颇为一致。

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身有菱形几何暗纹、云纹或火焰状纹等优美纹饰，剑格大多用蓝色琉璃与绿松石镶嵌成图案，工艺水平极高，埋于地下二千多年，至今寒光逼人，可见史载勾践佩“步光之剑”<sup>(11)</sup>绝非虚言。经x光荧光真空分析，此剑曾用硫化铜防锈法处理，与战国末年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以氧化铬为防锈法不同<sup>(12)</sup>。有学者又用x光衍射分析法证明剑基体是锡青铜，而花纹是锡、铜及铁的合金<sup>(13)</sup>，其工艺水平之高，可见一斑。此外，勾践剑的制作已采用复合金属加工工艺。经化验剑的主要成份是铜、锡，还有少量铅、铁、硫等，剑体各个不同部位金属的含量不同，剑脊含铜较多，韧性好，使剑不易折断，而剑刃部含锡量高，使剑锋利，剑格中央和边缘铜锡的含量也不同。这种一器多种成份比例的方法和先铸剑脊、再浇铸剑刃的复合铸造工艺是相当进步的，可称得上是刚柔相济的特种青铜剑。专家指出，春秋晚期吴越“青铜剑”的铸造水平远远超过中原诸国<sup>(14)</sup>。

进入战国之后，随着越国的衰弱和楚国的东渐，长江下游、东部沿海楚文化的影响日增。

建国以来，发掘楚墓总数已超过4500座，占已掘东周墓葬总数的70%以上<sup>(15)</sup>。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对楚铜器独特风格和铸技的研究是了解楚文化的重要方面，已引起广泛的注意，以下仅就东周楚式铜器的特点作一概括并略述己见。

楚国在东周时代灭国四、五十之多<sup>(16)</sup>，这些诸侯国大都在鄂、豫交界一带，汉淮二水之间，同时楚国也将其文化传播到这些地区，一些原属中原系统的国家，很快吸收了楚文化因素，比较典型的是蔡昭侯墓和曾侯乙墓均出土大量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铜器，学者称之为楚式铜器，从而在文化史上逐步形成以楚国本身为中心的一个新传统<sup>(17)</sup>。

据研究，楚式青铜礼器独特风格和楚文化总体特征的开始形成，当于春秋中期前后。典型的楚式礼器如鼎、盃、甗、缶等，或是楚国独创的

型制，或是在中原系统器形上加进了楚文化因素，不少器物多有创新，在工艺技巧、艺术风格上超过中原地区同期类似器物，并转而影响中原列国和其它地区。以前我们只注意到楚器模仿中原器物的一面，而忽略中原某些器物模仿楚器以及楚器向中原地区流传的一面，显然是有误的。楚器中的盃、敦等就明显地存在着由南向北流传的情况。楚器独特风格的形成反映了它极善吸收周围地区文化的先进因素，而非消极地照搬套用，同时也显示了其文化根基的深厚，有能力兼收并蓄且极富创新精神。

以青铜技艺为例，中原出现了浮雕状花纹和嵌错图纹的新技术，以晋及后来的三晋为代表。而在楚国出现的是更繁复的镂空花纹。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青铜器群达到这一类器物的巅峰。如所出盘尊有立体浮雕状镂空蟠虺纹，其精细犹如丝瓜络，且互不接续，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承，铜梗分层联结，混然一体，经研究系采用失蜡法铸成<sup>(18)</sup>。该墓青铜器合范铸造术也达到新的高峰，仅以编钟为例，不仅数量多，重量大，而且铸工极精美细致，如中层甬钟的铸型，用范、芯136块组成，钟虡底部满布高浮雕、蟠虺纹，没有娴熟技术是无法想象的。<sup>(19)</sup>

目前已知国内最早采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的器物，是在河南浙川下寺二号春秋楚墓中出土的云纹铜禁<sup>(20)</sup>。禁体部分用25块蜡模分块捏制，再合成一个完整的模铸型，使体积大而结构异常复杂的禁体一次铸成，似透雕而胜于透雕，显得生动活泼，玲珑剔透，铸造工艺之高超为同时代器所望尘莫及<sup>(21)</sup>。

楚器中嵌错工艺（嵌铜或金、错金、银）、针刻工艺、模印制范工艺、焊接工艺等均有独到之处，毫不比其它各国逊色。当然，楚国发达的青铜工艺并非一花独开，秦、晋、齐以及吴越等国均有独到之处，春秋中叶之后都已形成各自特色。由于楚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辽阔的疆域，其对北方、尤其是对南方广大地区的影响不可低估。东周时期，楚国一方面与中原列国抗争，饮马黄河，问鼎周庭，长期与秦晋争霸称雄；一面积极向江淮、江湘等地发展势力，并进而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我国南方空前的大国。考古资料表明，楚的势力一直影响到岭南，深入广东广西的腹地<sup>(22)</sup>，在秦灭六国前，楚国实际上已统

一了南半部中国,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秦汉统一的政治经济基础,其作用之巨是毋庸置疑的。

巴蜀文化基本上在四川境内,在相邻的湖北、湖南、贵州的某些地点也有分布。历年来,相当于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屡有发现,其中礼器较少,容器中的鬲多见,其形制与中原相类,但一般形体深厚雄伟,器身饰有立棱和立体怪兽,在彭县竹瓦街二个窖藏中出土9件铜鬲,其中“羊头饰大铜鬲”和兽面饰象头铜鬲分别高达79、69.4和70.2厘米<sup>[23]</sup>。铜器中动物形纹饰的浮雕运用广泛,此外有铭铜器极少见,在一些巴蜀青铜器上多有特殊文字的铭文,被称之为“巴蜀图语”,这种文字在战国中期以后渐渐消亡,至今尚未能释读。某些器物从形制上看与中原同类器相仿,纹饰却有了变化,是经过改造的地方产品。

巴蜀青铜遗物中以兵器最富于特色,且出土量也最多。其中剑、钺的形式与戈、矛上的纹饰最具地方特征。剑均作柳叶形,扁茎、无首,柄上两穿,用以装柄。一种宽而长者,肩以上往往铸或刻有手、心纹、虎纹。还出土带剑鞘的双剑。戈的个性更为明显,其演变自有脉络,与中原相异,其特殊性表现在多方面,如带有下胡或上下胡对称的戈,戈穿形式呈“桃花形”、“菱形”等,纹饰上地方色彩浓厚<sup>[24]</sup>。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与楚、秦交往频繁,相互之间影响颇多,但自己的传统与风格仍然存在,个别地区一些器物在秦占领之后,仍保存相当长时期。

我国青铜铸造业在殷末周初发展至一高峰时期,器物厚重,崇尚繁缛华丽,庄重而神秘,西周中晚期作风转趋简陋轻率,纹饰少变而单调,进入所谓的“颓败期”<sup>[25]</sup>,这一状况至春秋中叶为之一变,重新崇尚繁缛华丽的装饰,但和商末周初的神秘诡异不同,纹饰多为现实性动物,式样翻新,形巧实用,有清新秀逸之气。这是我国青铜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即所谓“中兴期”。至战国末年,青铜器铸造又归于简朴,渐至转入铁器时代。纵观中兴期的青铜铸造业,南方楚国、吴国、越国,北方的晋(三晋)、西方的秦,东方的齐都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相互间的影响,交流也相当频繁。

以巴、蜀、楚、吴越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业在前期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自己的风

格和特色,无论在器形塑造、铸造技艺、矿冶技术等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吴越兵器、农具之精良,楚器形式之丰富,加工之精细,工艺水平之高超,对各国影响之深广是举世公认的,总的水平非但不比列国落后,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某些方面如失蜡铸造术、嵌错工艺当属列国之首,这是春秋中叶后整个青铜业“中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来自长江流域的新技艺为古老的青铜业注入了新的生机,焕发了青春。中兴期的青铜业是南北融合的产物,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业的最高水平。

### 三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些同志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唯一的发源地,自觉不自觉地吧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而把周边的部族、方国统统斥之为“夷蛮”或“戎狄”,似乎当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原各国时,这些地区都还处于一片荒漠和混沌之中,这些地区的任何发展都是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文明的渊源是一元的,文化的传播是单向的,青铜文化也是从中原衍发并辐射到各地。传统观点的弊病在于把中华文明与中原文明混为一谈,把文化的传播、交融的多向复杂性简单地理解为单向批发式。于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及文化的传播变得简单而明了,大凡中原以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皿非“舶来品”,即仿制品,时代上自然晚一个时期(数年至数百年不等),并未仔细研究谁是源,谁是流,还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产物,极大影响了对中原以外其它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古代的文化),在当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的传播和衍化都同时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文化传播上的辐射性,把某种文化内涵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辐射状地传至四邻或更遥远的地区,石器时代,虽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各种文化的辐射强度一般较弱,但也绝非“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文化的传播、影响、吸收和变异是客观存在的,到了青铜时代,随着国家的建立,文化通过行政和非行政的手段加强了辐射性。文

文化传播中的辐射性各种文化均具有,只是强弱程度不同,不独中原文化才具备。这种辐射性使某一文化区域的外缘不断扩大。其二是文化衍化上的辐辏性,周边文化内涵象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为某一文化的发展丰富提供了养料,这一特性在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在文化发展水平迥异地区也同样存在。某一民族、国家的文化毫无例外地将吸收、消化周围民族、国家的文化因素,所不同的是强弱程度上的差异。当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文化上的辐射性和辐辏性必将在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已经很难找到一种完全孤立发展的文化。国外学者用文化的交互作用圈(文化圈)和地域共同传统的理论来解释各文化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提出“没有哪个地域文化发展是孤立的”<sup>(26)</sup>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我国夏商周时期,中原政权在其自身发展完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诸如战争、掠夺、通商、交换、朝聘、进贡、通婚等多种方式把文明的信息,帝国的威权传至四方,这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承认并加以渲染的,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看到,三代面对的不是一片荒漠,以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论,不少部族已经具备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内在因素,三苗先民,良渚文化先民及其后裔已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继而又建立了一个个奴隶制国家,它们所创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也必然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渗透到其它地区。各地区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交际手段的增多而不断加强,虽然影响的程度不平衡,浸透的能量有大小,但其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仅仅只强调来自北方王朝的“中原文明”对“南蛮之人”的教化和影响,而忽略或从而完全否定南方对北方的影响,这是非常片面的,也是有碍于研究深化的。毫无疑问,各地在发展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先进的中原文化(例如青铜文化的影响),甚至强烈影响,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我们还应看到:

长江流域各地青铜器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这在纹饰和某些器物上反映极为强烈,形制上仿中原铜器,而纹饰上却是当地传统,不少器物仅是形似而实非,经过了改造加工,这说明来自北方的影响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南方的传统,表明南方青铜文化有自己的根

基和系统,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的风格,此其一。

在矿冶、铸技、纹饰、形制等方面都可能存在着来自南方的反影响。不承认这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据研究,商周铜器中流行的云纹、回纹、饕餮纹、兽面纹都可在江南原始良渚文化中找到它的雏形;几何印纹的复合图案在江南印纹陶上屡见不鲜。一些器物是南方传统的器物,如敲击乐器钲<sup>(27)</sup>、铙<sup>(28)</sup>、早期甬钟<sup>(29)</sup>等等就存在着由南向北流传的过程。同时,也不应排除某些器物形制、纹饰由北方传入南方,改造后再北传或由南方传入北方后的再南传。总之,文化的融合是十分复杂的,存在着相互吸收、交替影响、借鉴、多次循环的过程,简单地把这一过程理解为单向传递,一次而终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辩证法的。此其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民族(部)族、地区间交往的特殊手段。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传播文明,也可能使某些地区的文明之火熄灭,对于胜利者来说,是聚敛财富、扩大影响、开拓地盘的重要方式,对暂时处于落后的地区征伐,则可能造成部众被杀戮俘获、财富遭焚劫,城池被夷毁,甚至文明进程中,直至灭宗夷族的惨祸,或者造成对战败地区坚不可摧的政治军事压抑,加上无休止的朝贡献纳,征税服役,束缚了某些部族、地区的进步。而“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描述的。创造历史的功绩自然也记在胜利者的功劳簿上,对于失败者而言,除了污蔑性的语言、讨伐时的“罪状”,他们创造历史的功绩在文献中几乎荡然无存。历史的尘埃(人为的和自然的)无情掩埋了失败者的业绩,现代考古成果部分地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使我们有可能从广泛的范围里来认识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初期的真缔,认识中原以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

历史上的所谓融合(文化与民族上的融合)在古代一般表现为非主观意识的客观效果。除了野蛮的征服、无止境的掠夺等形式外,有意无意的交流,技艺上的潜移默化是大量的,这种交流必然导致双方经济文化上的缓慢启发、融合,正象我们无法否定来自北方政权中心对南方的强烈影响一样,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来自南方某些先进因素的渗透。

长江流域地域辽阔,先秦时期生息着众多的部族,东南为荆蛮、百越,汉水流域为荆楚、川、贵、滇为巴、蜀、濮等,文化渊源不同,发展水平不平衡,那里的青铜文化呈现多元的复杂现象,他们与中原政权之间都存在着接触与交往,相对而言,愈是善于吸收外来因素的地区或国家,其发展就快些,我们从楚式铜器的形成和发展,既看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看到了

楚文化的反影响。秦统一六国,融南北文化于一炉,标志着两大流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的初步统一,这是秦汉时代出现封建政治经济高潮的重要原因,也是华夏民族(汉族)正式形成的标志。

(本文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历史系主任)

(1)曾昭燏等:《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4.

(2)《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4.

(4)《吴城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青铜兵器》,《文物》1980.8.

(5)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7;裘士京《文字起源和南方古文字问题的探索》,《文物研究》第五辑.

(6)《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三集,文物出版社.

(7)《文汇报》1990.1.14《新赣掘出商代珍宝》.

(8)《出土商代蜀国文物堪称人间奇珍》,《文汇报》1987.10.9.

(9)李学勤:《从新出土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10)邹厚本:《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11)《越绝书》卷八.

(12)《越王剑的质子x荧光真空分析》,《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11.

(13)陈佩芬:《古代铜兵铜镜的成分及有关铸造技术》,《上海博物馆馆刊》1号.

(14)冯普仁:《吴国青铜兵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5)王世民:《楚墓简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文中统计已掘楚墓达3500座以上,加上三年来所发表的数字,总数达4500座左

右.

(16)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卷四《楚疆域论》曰楚灭国凡四十二.近人何浩《春秋时楚灭国新探》考证为五十四,详见《江汉论坛》1982.4.

(17)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

(18)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7.

(19)华觉明:《曾侯乙编钟及龔虞构件的冶铸技术》,《江汉考古》1981年1期.

(20)《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10期.

(21)任常中、王长青:《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云纹铜禁的铸造与修复》,《考古》1987.5.

(22)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81.11.

(24)杜乃松:《论巴蜀青铜器》,《江汉考古》1985.3.

(2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彝器形象学试探》和《青铜时代》.

(26)(28)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7)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

(29)殷玮璋、曹淑琴:《长江流域早期甬钟的形态学分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